

· 军队“2110工程”军队政治工作学学科 ·

错失与机遇

二战以来的中美军事关系研究

张
芳
◎
著

二战以来的中美军事关系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显得斑驳陆离，但美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决定了我们对其留下的历史痕迹进行分析的现实意义。美国习惯于谋求平衡，却总是引发不平衡。今天的“亚太再平衡”亦是其巩固全球霸权的地区战略，但历史上的不平衡的结果是否还会重演？那些美国曾经的对华外交道义层面的信誉差评是否还会逆袭？这些仍存有疑问。

时事出版社

· 军队“2110工程”军队政治工作学学科 ·

错失与机遇

二战以来的中美军事关系研究

张
芳
◎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错失与机遇：二战以来的中美军事关系研究/张芳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2016. 6

ISBN 978-7-80232-994-2

I. ①错… II. ①张… III. ①中美关系—国际军事关系—
研究 IV. ①D822. 371.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0398 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100081

发行热线：(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010) 88547595

传 真：(010) 88547592

电子邮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www.shishishe.com

印 刷：北京市昌平百善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6.5 字数：286 千字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2013年5月，安纳博格庄园，最大的发达国家首脑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首脑就建构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达成一致。这场跨越太平洋的握手重塑着一个机会——一个在20世纪曾经多次在历史关键转折中被错失的机会。

如果以两个民族的历史长度加以比拟，美国是一个被理想拽着满世界奔跑的少年，而中国是一个历经沧桑步伐坚定的长者；因为年少，年轻人往往在充满力量的奔跑中失去了方向，因为历练，长者更懂得以平和心态珍重相遇之机。

这是两个国家的完整比拟吗？是，又不是。对于真正参与到现代国际社会活动的时长而言，新中国算不得经验老道，而美国则是惯玩贸易、军事与外交“三球”不落的高手。

诚然，有人更愿意指出两个国家间诸多的不同，然而，不同的背面潜伏着诸多的相同，国家间的相处并不仅因为相同，因为不同才有相互吸引、契合的可能。

有学者指出，今天的中美又站在了世纪的十字路口。此话差矣：又站在十字路口的是美国，而非中国。此前的历史中，中国是无以选择，因而无所谓十字路口；而今天的中国是因为坚定地沿着和平发展的道路向前挺进，因而也无所谓十字路口。

在中美军事关系的回溯中，那些被错失的机遇终究不能被再次假设；当再一次的重逢来临，机遇的把握应该接受历史的审视。

目 录

绪论	(1)
一、关于中美军事关系	(1)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9)
三、本书的研究思路、主要观点和创新点	(11)
第一章 三组概念的解析	(14)
一、军事与外交	(14)
二、军事外交与军事关系	(24)
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及新型军事关系	(28)
第二章 1944—1949 年：从“合作”到“敌对”	(47)
一、全面抗战时期的中美军事关系	(47)
二、抗战后期的中美军事关系	(55)
三、解放战争时期的中美军事关系	(60)
第三章 1949—1989 年：从“敌对”到“蜜月”	(63)
一、“一边倒”战略时期的中美军事关系	(63)
二、“两条线”战略时期的中美军事关系	(75)
三、“一条线”和“一大片”战略时期的中美军事关系	(87)
四、中美正式建交后的军事关系	(97)
第四章 1989—2013 年：从“挫折”到“磨合”	(111)
一、1989—2001 年：中美军事关系的“挫折期”	(112)
二、2001—2013 年：中美军事关系的“磨合期”	(122)

第五章 2013 年至今：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探索期”	(132)
一、管控分歧，避免误判，机制性建设取得新突破	(133)
二、深化合作，增强互信，军事交流层级有所提升	(135)
三、开展对话，扩大共识，对话深度和广度明显增强	(137)
四、障碍未除，掣肘因素依存，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构建面临 新旧挑战	(139)
五、2015 年中美军事关系	(141)
第六章 影响中美军事关系的重要因素分析	(147)
一、环境性因素	(147)
二、策略性因素	(163)
三、认知性因素	(174)
第七章 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构建面临的挑战	(192)
一、固有障碍与中美新型军事关系	(193)
二、美国亚太军事部署与中美新型军事关系	(200)
三、中日钓鱼岛争端与中美新型军事关系	(207)
四、南海问题与中美新型军事关系	(211)
五、朝核问题与中美新型军事关系	(216)
六、网络安全问题与中美新型军事关系	(218)
第八章 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构建路径——以中方的视角	(222)
一、实现从应然、实然再到必然的思维转变	(223)
二、消弭结构性矛盾，把握可控性因素	(226)
三、建立渐进式交流机制，促进肯定式军事合作	(232)
四、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未来	(235)
参考文献	(241)

绪 论

研究国际关系史总会碰到双边和多边的复杂矛盾，但是最主要的应该是当事国的双边关系这一对矛盾。因此研究两国关系史，必须要研究这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而不是一个方面。即研究中美关系史不但要研究中国，而且要研究美国；不但要研究中国对美国的反应，而且要研究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不但要研究这些互为作用的反应，而且要研究这些反应通过各自国家内部因素而起的作用及其连锁反应。只有把一个事物的矛盾双方及其运动的全部过程研究清楚了，才能对这一事物有较深刻的理解。

——汪熙（《中美关系研究丛书》前言）

不过我强烈地希望读者去关注更宽广的世界舞台及出场的其他演员，我所描述的情节都是在这个舞台上发生的。

——【美】孔华润（Warren I. Cohen）

一、关于中美军事关系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极为矛盾的，令人诧异的是这种矛盾性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延续至今。基于这一认识，本书试图“在历史进程之全时期中，求其体段，寻其态势，看他如何配搭组织，再看他如何动进向前。”^①

^①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弁言第7页。

19世纪,广州被认为是美国在摆脱了大英帝国的控制之后所谋求的第一个海外市场。然而,这种跨越了太平洋的交往随之产生了矛盾:一方面,美国的传教士和商人认为美国的使命是改造中国古老的文明使之现代化;但另一方面,中国的移民却在美国受到了嘲笑和仇视,并在1882年遭到驱逐。^①

1899年9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向德国、英国、日本、意大利、法国发送了关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声明。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孤立主义与干涉主义之间,在目的与手段之间,美国时常为了保持平衡而事实上处于摇摆不稳的状态。正如美籍学者邹谠所云,“从送交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到北朝鲜进军前夕这段时间内,美国的中国政策的失败是由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所决定的,这就是目的和手段之间失去了平衡。”^②美国所说的门户开放政策包括尊重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和最为有效地坚持贸易机会均等,两者之间存在着逻辑必然:“尊重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完整的原则首先是门户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是以政治手段实现经济目标,或者说,只有维护中国的主权完整才能最有效地坚持贸易机会均等的原则”。^③在这一利益驱动下,美国在远东的政策是积极的、“干涉主义的”,而在欧洲的政策则是消极的、“孤立主义的”。但是,在维护这一政策的实施上,政治目的和军事手段的正确顺序被颠倒。

在这样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区间中,在强权即“公理”的国际环境下,不能不从美对华所为中清醒地进行简要总结:第一,美国是一个用商业思维来处理国际关系的国家,利益是其始终不变的首要追求;第二,美国精于玩转贸易、军事与外交“三球不落”的手法,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第三,作为英国的学生,美国很快掌握了对华“态度坚定是最重要的,凡有必要时就用武力”的“适用办法”,借英国实力达到自己的目

① 【美】孔华润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汪熙主编:《中美关系研究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2版,第1页。

② 【美】邹谠著,王宁、周先进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③ 【美】邹谠著,王宁、周先进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的——“狮子一吼，猎物到手；豺狼微笑，拾起骨头”^①；第四，尽管美国由于自身实力还不足以如英法两国般施展军事与外交的手腕，是一个“腼腆”的侵略者，但这并不改变“侵略者”这一本质；第五，在“炮舰”之后，美国传教士们得以不加约束地在清末的中国输出文化，试图将自认为“优越”的价值观念强加给中国人。

与当时的美国相比，清朝政府对美则带有太多的一厢情愿，尽管有识之士对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但依然不能击碎清廷耽溺于对美的幼稚幻想。在对虎狼世界懵然不知、对“国际法”及规则的意义不知更不能为己所用、对技术改变国家发展现状后知后觉等诸多因素背后，最后的也是最为真实的因素便是实力——除了实力，还是实力。在没有规则的世界，强权即是规则；在规则正在形成中的世界，拥有实力者制定规则；在规则既定的世界里，实力者才有可能改变规则。这是列强用耻辱和强权给近代中国上的一堂深入骨髓的国际政治课。但，这是开始，也是结束。

20世纪20年代，美国对华的态度继续徘徊在吸引和排斥两极之间。美国宣布采取门户开放政策，保持和发展在中国的贸易，但是并没有促其实施；美国提倡变革和现代化，却对20年代在中国涌现的革命派蹙额疾首。^②

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把中国列为第三等参战国，只给了蒋介石象征性的援助；而当日本将侵略的战火推向中国领土腹地，美国使用了武力，但即使此时，美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使中国能够继续参战。在雅尔塔，罗斯福事先并没有征得蒋介石的同意便把中国东北的铁路和港口控制权转让给了苏联。这一段历史的回顾让人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印象深刻。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与美军开始了一段军事交往。抗战初期，毛泽东首次正式批准了西方新闻记者斯诺对苏区的采访，并以坦诚开放的态度向他详细介绍了中共的革命，由此打开了中国人民军队与外部世界接触的大门。1941年2月，美国总统特使来华访问期间

① 【美】孔华润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汪熙主编：《中美关系研究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2版，第13页。

② 【美】孔华润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汪熙主编：《中美关系研究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2版，第1页。

会见了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尽管此次会见没有取得美对华的援助，但却是中共领导人与美国高级官员的第一次正式面谈。第二年，以谢伟思、戴维斯为代表的部分驻华使节及美军在华军事顾问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呼吁下，主张去延安进行考察。全面抗战时期，美军观察组（史称“迪克西使团”）于1944年7月和8月分两批到达延安访问。这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军方的第一次接触，也正是在这次接触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制定了第一份外交工作方针性的文件——塑造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雏形。^①1944年9月，毛泽东、刘少奇给饶漱石等的电报中明确提出了与美军进行军事合作的方针：“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的既定方针。”^②在高层交流方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人亲自接见观察组并系统宣传了中共的抗日方针和革命政策。在军事训练方面，边区官兵和美军观察组人员进行了多次的军事技术、技能及训练方法交流，为了让观察组成员更深入地了解延安的军队和地方建设情况，中共安排了参观延安的活动，还组织部分成员分赴晋绥、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在军事情报合作方面，中共根据美方提出的迫切要求，决定在敌后各战略基地的司令部增设战略性的情报机关，即联络处，其职能是当同盟国家派遣军官到达抗日根据地时，由联络处给予情报业务上的帮助。据八路军不完全统计，直到抗战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向美方提供经整理过的情报共120多份，而美方也相应地给予了中共军队一定的情报支持。^③典型的战例是在1944年底至1945年初，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组织实施对武汉附近地区日军机场的进攻作战，由于新四军五师与美军在军事情报上的有效合作，美军以极小的代价，击毁日机近百架，基本上消灭了武汉地区日军的空中力量，重新夺回了华中地区的制空权。在作战配合方面，对于美军提出我军在华北、华东和华南地区配合美军登陆部署的问题，中共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对于中共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在向上

① 袁野：《毛泽东的军事外交思想》，《国防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第35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44页。

③ 孔繁政、陈政勇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统战与军事交往》，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

级的报告中说，中共当局给予了观察组最热心的合作。抗战后期，随着日军逐渐走向覆灭，美国对华政策开始调整，美国与中共军事关系开始发生逆转。史迪威作为主张援助中共的美军在中国的最高指挥官被召回国。在蒋介石的外交压力下，罗斯福在1944年10月召回了史迪威。之后，美国对中共的态度在接任的赫尔利导演下进一步恶化。1945年7月起，按照军委指示，中共停止向美军观察组提供机密性情报，对到前方各地区活动的观察组成员，也做出了相应的限制。1947年3月11日，美军观察组在胡宗南向延安进行轰炸的前一天撤离。中共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彻底破裂。

如果拂去历史的光斑，直视这一历史时期的人民军队与美军的军事交往，有一些特点值得回味。

其一，利益需求决定了军事交往的长久与短暂。“任何持久而有效的交往与合作都必然建立在利益互补的基础上”^①，尤其是战争中的军事合作，无不是以利益互补的多少作为关系维系时间的测量。在抗日战争开始前，美国出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考虑，为国民党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国民党用这些军援来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战开始后，面对共同的日本法西斯敌人，美国对国共两党争端采取的是不愿介入的态度。随着抗战的展开，当美国对国民党的表现感到失望，同时出于“调查日本军事情报”、“准备美军在共区作战之方法”、“调查中共实力”、“视察华北、东北有无成苏联傀儡政权之可能”^②的目的，派出军事观察团前往延安。客观地了解到真实的中国共产党时，美军与中共军队曾有过一段不错的军事合作。而到了抗战后期，随着共同的敌人逐渐走向失败，双方合作的前提也就不复存在。很显然，美国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始终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仅是美国，苏联也同样如此，抗战期间，之所以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飘忽不定，正是苏联严重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在作祟。这些都印证了外交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的著名论断。正是基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军事外交实践，发展自身的力量愈发明确

① 孔繁政、陈政勇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统战与军事交往》，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页。

② 孔繁政、陈政勇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统战与军事交往》，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页。

地成为了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

其二，战争背景决定了军事交往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中国共产党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的历史经验表明，“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①，因此，“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②。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武装斗争的背景往往是较为复杂的，各种政治力量与军事力量在不断变化着的战争背景下发生着此消彼长的变化，因应这样一种战争背景的复杂性，中国共产党在对外军事交往中始终坚持原则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相统一。因此，在抗日战争时期，尽管与英美等国意识形态的不同，但中国共产党并不以此来划分敌友，不过早定性，而是利用有利的国内和国际条件，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抗战政策，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与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坚决抗战的能力与决心，从而在国际上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民是中国抗日主力军的形象。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同时，也同“任何形式的东方慕尼黑”做着坚决的斗争，强调中国抗日的外交政策是“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③，在务实地坚持策略上的灵活性的同时，也确保了原则上的坚定性，实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

其三，军事外交的功能发挥以军事力量的强大为前提。革命战争年代里的对外军事交往实践告诉我们，无论是要实现军事外交在战争中直接为战争服务的功能，还是要实现在平时时期为国防与军队现代建设的服务功能，亦或者战争与平时时期的外交作用，无不是以自身力量的强大为前提的。抗日战争时期美军和苏军对人民军队的有限援助是对这一问题的充分诠释。在太平洋战争接近尾声时，中国之所以成为了美苏两国之间讨价还价的筹码，就在于实力外交法则里力量弱小者总是被动地接受利益分割的命运。

① 毛泽东：《论政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五册，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616页。

② 毛泽东：《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五册，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页。

③ 毛泽东：《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0页。

新中国建立后，1950—1967 年中国围绕着朝鲜问题、印度支那问题、台湾问题与美国进行了顽强的较量，其中既有兵戎相见的军事斗争，也有纵横捭阖的外交斗争。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苏联取代美国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和直接的威胁。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开始考虑打开中美关系的僵局。

1972 年 2 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破了建国以来中美之间隔绝对立的局面，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由此拉开了两个不同意识形态的大国构建大国关系的帷幕。离开中国前，尼克松在欢送他的宴会上说，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此时，已经当了 3 年总统的他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不得人心的越南战争和与苏联争霸的失利都在迫使他不得不另辟蹊径。而中国与苏联 1969 年刚爆发冲突，关系恶劣。联合抗苏的共同需要使得双方度过了一段“蜜月期”，双方对彼此都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 1979 年 1 月邓小平对美国的访问，更是帮助他完成了对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准确定位，实现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

然而，1989 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使得中美关系一度降到了建交以来的冰点；1991 年苏联的解体，更让中国的抗衡作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大洋彼岸，美国国会一次次地提出不再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老布什总统批准了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 150 架 F-16 战斗机。克林顿上台后，美国更是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挂钩，1993 年 7 月爆发“银河号事件”，9 月，中国申奥由于美国阻挠而未果。1995 年夏天，李登辉以“校友叙旧”的名义对美国进行所谓的私人访问，打破了中美建交 16 年来的禁忌。1996 年早春，解放军在沿海进行导弹发射演习，此举招来了美国的两艘航空母舰，与解放军形成对峙。这一阶段的中美关系充满了摩擦与博弈，可谓险象环生。

在此背景下，江泽民主席在 1997 年 11 月对美国进行了访问，但中美关系并未因此峰回路转。1999 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和 2001 年的中美军机相撞事件，使得两国之间的紧张气氛似乎一触即发。

“9·11”事件改变了一切。美国战略重心向中东和反恐的转移，使中国获得了宝贵的战略机遇。2001 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发展

一日千里，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这段时间，是中美关系相对平静的时期。2002年胡锦涛担任副主席时的访美行程，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国受到的打击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全国上下的焦虑通过奥巴马“美国不能接受第二名”的表态而表露无遗。

中美关系因此在2009年下半年以来摩擦不断，似乎进入了新的震荡期，集中表现在贸易和反倾销问题、达赖问题、对台军售问题、气候问题、互联网管制等多个方面。美国把战略重心转向太平洋地区，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态势已是十分明显。而2010年以来中东的变局，更进一步凸显了双方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分歧。习近平的访问虽然圆满成功，“太平洋够大，足以容下中美两国”^①也是事实，但必须现实而清醒地承认，中美关系的变迁，遵循的是更为本质和现实的逻辑，那就是两国之间的力量对比。

2012年2月，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了为期5天的正式访问。此时，距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的握手已经过去了40年。40年来，两国贸易额增长了180多倍。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第六大进口来源地、最大的外资来源地之一。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但从克林顿时期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到小布什的“战略竞争关系”、“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再到奥巴马时代的“战略再保证”和全面互利的经济伙伴关系，定位上的摇摆充分说明了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

正是在历史的这个当口，2013年6月7—8日，习近平在与奥巴马的会晤中提出关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议题，美方表示接受。至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美开启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里程。

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必然组成部分。“国与国之间有了真正意义的国际关系，于是便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外交’”^②。外交是国与国关系构建的主要方式，军事外交同样是构建国与国军事关系的主要方式。那么，究竟该如何发挥好军事外交的重要作用构建中美新型军事

① “习近平说‘太平洋够大，足以容下中美两国’的深意”，强国社区，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32306/33232/17111739.html>，最近浏览日期：2016年5月3日。

② 陈乐民：《“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

关系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重要的大国关系，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最难也是最为关键、最为敏感的就是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中军事外交研究领域里的一个极待回答的重要问题。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下棋如此，战争也是如此”。^① 战争如此，外交也是如此。对于中国和平发展战略这一棋局而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全盘中带有全局性的局部，相对于这个局部，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则是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构建。其成功构建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完成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历史性创举，更在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在其他外交关系中中国国家和平理念和外交道义价值的示范效应以及可能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当前，和平崛起的中国在各领域都在试图寻找到转型的突围路径，以期形成与中国未来发展角色相匹配的大格局。本选题作为严肃的学术研究，将从理论的、历史的、现实的视角研究剖析中美军事关系的发展，并在探寻可能性路径中对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构建提出可行性建议。其研究目的和意义在于：

（一）探索分析中美军事关系的理论方法

对于中国的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的研究学者而言，中美关系是始终处于进行状态中的研究主题。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所云，“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上有两个大课题，一个是如何看美国，焦点是看美国如何适应新的、更加多元的国际环境，如何调整 and 选择政

^① 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中的战争战略问题》，《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95页。

策；二是如何看中国，焦点是作为一个主要的新变量，中国将如何影响世界的走向。因而，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美国这个最强大的发达国家将如何相处？这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界最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①

在国家与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剧，摩擦与竞争也与此俱增的全球化时代，军事的部分功能与意义正趋于“非战争”——军事外交应运而生。军事关系，作为在军事外交行为的作用下，国家间或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在军事领域及其军事活动中的关系状态的一种定义，在大国关系中所占权重不断上升。中国作为一个致力于建设和平民主的国际秩序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的社会主义大国，如何以和平的方式运用军事力量实现维护国家利益与维护世界和平的统一？如何与仍在使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美国和平相处、成功构建新型军事关系？这是在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的今天，中国实施和平发展战略中一个极为重大而紧迫的现实问题，也是本书的中心论题。

对这一论题的回答首先需要构建中美军事关系的分析理论。分析中美军事关系的文章不胜枚举，但历史条件的变化，又使得这一领域对于科学分析并预测中美军事关系的发展提出迫切的理论需求。中国需要打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羁绊，形成并创立中国分析研究中美军事关系的话语体系、研究逻辑。有学者认为，当前的军事理论正在沿着两个方向迅速发展：一是“战胜”理论，二是“不战而胜”理论。前者往往通过武器装备及作战理论的优势取胜；后者通过伐谋、伐交占领控制舆论制高点而赢得胜利。中美两国有着不同的军事战略文化和外交传统，又有着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合作，无论是战略上的宏观运筹还是实践积累，在此基础上建立中美军事关系理论，从而更加理性地指导中美军事外交活动的时机业已成熟。

当前，中美之间来源于不同的政治传统、价值体系和文化，对于彼此决策过程以及政府其他实体之间关系的理解和认知程度、对中美之间实力差距日益缩小的认知等已经成为中美之间不断增长的战略互疑的主要来

① 傅莹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举办的《美国蓝皮书》发布会上的主题发言（2014年8月），傅莹：“美国‘跟我走帮我忙’思维让中国难以接受”，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8-06/6464916.shtml>，最近浏览日期：2016年5月3日。

源。中美双方需要“对症下药”，对影响中美军事关系构建的历史因素、文化因素、体系和决策过程等诸因素进行系统分析，从而搭建起中美军事关系的“理论大厦”，为决策分析提供理论依据，为规避风险和提升合作效益提供预测性分析。

（二）为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提供实践参考

针对现实问题从理论本原中寻求开启之匙。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那样，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这里，马克思向精神产品的生产者提出了思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中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的难点和关节点在于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是和平发展战略布局中的局部，但却是一个对全局有重大影响的局部，这一局部问题的解决将会起到局部跃升带动全局深入的效果，一定意义上会成为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强心剂。

现实情况是，美国在冷战后 20 多年里与中国进行了数次对立对抗。近年来，美国在东海、南海等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再掀波澜。正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要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着眼于将两国关系引向和平合作的轨道。关系的构建不是简单的一拍即合，双方寻求的更高级的军事关系目标是合作共赢，不仅要双方都主动推进，还需要双方都能够妥协，能够照顾对方。不是总要求一方满足另一方的需要，而应当是真正的平等合作，双方都有进有退。今天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仍然面临着台湾问题、美舰机抵近侦察、美国对中国军事技术出口限制等一系列旧有的掣肘问题，而新的挑战层出不穷，面对这一系列问题，中美双方在安全领域如何破题，如何建构实现中美军事力量和平运用效能最大化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本书的研究思路、主要观点和创新点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围绕着中心论题进行的。本文的中心论题是“中美军事关系研究”，主要是以历史为轴纵向分析二战以来的军事关系发展历